



中国文化视角与 世界文明前景

评“历史终结”论与“文明冲突”论

程 麻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中国文化视角与 世界文明前景

评“历史终结”论与“文明冲突”论

程 麻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对西方“历史终结”论与“文明冲突”论之世界性论题的最新阐释与对话。本书立足于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长期积累的学识,冷静面对苏东解体后欧美的舆论躁动,从东西方文化传统关系和异同着眼,以中国文化传统精化解读近代以来西方文明的成果以及困境,理智、稳健地阐释了中国对世界文化前景的导向作用。

本书适合对东西方文化感兴趣的人士阅读。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文化视角与世界文明前景:评“历史终结”论与“文明冲突”论/程麻著.--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9

ISBN 978-7-302-29487-0

I. ①中… II. ①程… III. ①世界史—文化史—研究 IV. ①K1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63005 号

责任编辑:刘美玉

封面设计:常雪影

责任校对:宋玉莲

责任印制:李红英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tup.com.cn>, <http://www.wqbook.com>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A 座 邮 编:100084

社总机:010-62770175 邮 购: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 量 反 馈: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 装 者: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70mm×240mm 印 张:16

字 数:259 千字

版 次:2012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3000

定 价:35.00 元

产品编号:048445-01

前言

中国与“历史终结”论和“文明冲突”论

近 20 年来,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和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先后推出的“历史终结”论与“文明冲突”论,堪称国际论坛上影响最大的话题之一。当初,借助于万众瞩目的世纪交替即所谓“千禧年”这一历史关节的放大效应,两人论断都曾先后诱发“一石激起千层浪”似的强烈反应,其中包括开始时差不多众口一词的追红吹捧,以及后来日见增多的揶揄甚至冷嘲热讽等。在人类历史的这仅仅一瞬间,它们在人们心中的评价竟有如此天壤之别,不能不令人感慨世界理论界的风向有点“白云苍狗”的味道。

如实说来,“历史终结”论和“文明冲突”论不约而同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命运,个中掺杂有当今流行文化常见的过度“炒作”倾向,无论当初“走红”还是如今“过气”,都多带情绪化的成分。原本应该属于严肃的理论思考与探索竟难以摆脱时代风气的捉弄,连累两位论者禁不住都屡屡出面“辨诬”,以澄清自己的本真意思。

像福山,曾不止一次表白过其提出“历史终结”论的初衷:

我之所以写《历史的终结》,因为我认为,20 世纪出现的种族屠杀、古拉格劳改营和世界大战等可怕的历史所造成的文明悲观主义并不符合历史的全貌。实际上,世界上还存在很多积极的发展趋势,其中包括民主扩展到此前由独裁者统治的地区。塞缪尔·亨廷顿把这一民主化浪潮称为“第三波”。它起始于上世纪 70 年代的南欧,那里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变成了民主共和国。后来,除古巴外的整个拉丁美洲也结束了独裁

时代。最后，柏林墙倒塌了，东欧也开放了。在韩国和台湾地区，民主也取代了独裁政权。上世纪70年代初期全球有80个民主国家，20年后增加到130个至140个。当然，也不是所有民主国家都坚持了下来。^①

福山坚称，自己的论断决非出自“意识形态至上”的偏见。他认为，所谓世界“民主意识的兴盛”归根结底源于民众生活水平的提升。他为《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再版加写的《前言》便刻意强调这一点，其中辩解道：

许多人把我的著作《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ost Man*)(1992)解释为赞同第一种看法：即在所有人中普遍存在着对自由的渴望，这将不可避免地把他们引向自由民主，而我们生活在一个正在加速追求自由民主的跨国运动之中。这是一个对论点的误导。《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说到底是一个对现代化的论证。人们最初的普遍渴求不是自由民主，而是想要生活在一个具有现代技术、高生活水平、医疗保健制度和能够接触更广大的外部世界的现代社会。当经济现代化取得成功时，就会造就一个需要保护其私有财产、有着更高的教育程度以及更关心他们作为个人得到承认的中间阶级，从而推动政治参与的要求。自由民主是这一现代化进程的一个副产品，是某种只是在历史进程中才变为人们所普遍渴望的东西。我从来没有设想过带有严格的发展阶段或经济决定后果的刻板的现代化理论。^②

不过，随着视界的扩展，福山后来面对欧美以外更多国家的实际状况也承认：基于以上逻辑而推导出“人类历史将止步于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判断有不够周严的缺憾。比如，中国在维持“一党统治”的同时，“出人意料地成功发展了资本主义经济”，这让自己的“威权制必将灭亡”的信条面临着最大的挑战。他说：“他们在威权环境下成功发展经济；你甚至可以说，因为威权，他们成功得更快。”^③他在接受《澳大利亚人报》采访时进而提到，自己面临着来自三个方面的挑战，中国是其中最难解释与处置的案例：拒绝现代化的伊斯兰文化不是一个可行的选择；而

① 《反对文明悲观主义》，载德国《世界报》，2009-11-02。

② 弗朗西斯·福山：《美国处在十字路口：民主、权力与新保守主义的遗产》，48~49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③ 马库斯·沃克：《柏林墙倒掉以后：民主影响力之辩》，载美国《华尔街日报》，2009-10-29。

俄罗斯的专制现代化也有很多重要缺点；最重要的是，“估计在未来一个时期，中国将会变得相对强大得多，所以在东亚，我们需要中国在一个不断发展的规则体系里成为利益攸关方。”^①

虽然此后福山的口风日见谨慎，多次设法对“历史终结”论拾遗补阙，可西方论坛似乎对这种“谦恭”并不领情，质疑的声音反而更加多起来。像一位叫亨利·波特的作家，曾在2007年12月23日英国《观察家报》上撰文说，他在1992年亲见过福山兜售《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一书，如今时过境迁，他想知道的是，“福山会如何解释2007年年末的时局，因为俄罗斯和中国并没有效仿西方的自由民主（事实上他们正在以蔑视的态度挑战这一模式），但他们看起来正在把事情办得更好。”这位作家最后调侃道：“福山的‘人类政治发展最后形式’也不过尔尔。”

不知道是否意在回应舆论界的这些质疑与批评，福山在2007年年底主编出版了一本名为《出乎意料》的新书，收录多名西方未来学家和政策分析家们的文章。福山在该书《序言》中坦陈，编辑该书的意图是：“预测并处理我们曾经认为的低概率事件，显然已成了全球公共和私人部门的决策者所面临的重大挑战。”值得注意的是，这本书里例举和分析到的“战略意外事件”之一，便包括“世界转向中国式社会主义，美国霸权地位结束：人们将许多不平等现象归咎于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全世界对这些不平等现象的不满，可能会将人们的注意力更多地转向像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模式，从而结束美国的霸权地位”。这似乎表明，福山已经正视“历史终结”论提出后世界进程的巨大变化，不过，看书中的文字，他似乎还无力令人信服地解释中国社会与经济能够迅速崛起的真正内在原因。

到最近，西方学界放胆贬低福山论点的语调已略显出刻薄的口气。一位新加坡学者甚至反用“历史终结”论去描述西方世界的前景：

西方人在读了福山著作后产生的一个普遍看法是，世界不管怎样都将变得更加西化。然而，情况刚好相反。现代化蔓延到全世界，但与现代化相伴的是“去西化”而非西化。福山目前认同这一观点。就像他在最近接受采访时说的，“现代化观念的老版本是以欧洲为中心的，反映的是欧洲本身的发展。那确实包含试图以一种相当狭义的方式定义现代

^① 《澳大利亚人报》，2008-05-27。

化的特征”。

因此,在21世纪,历史发展的方向将刚好与西方学者在1991年预见的相反。那时,他们都认定,历史的终结是西方的胜利。然而,我们今天看到,历史的回归将是西方的退却……

在这里,也像21世纪所展现的那样,我们将看到刚好相反的结果。与亚洲崛起相伴随的将是亚洲惊人的文艺复兴,许多不同的亚洲文化将在其中重新发现他们丧失的艺术和哲学传统。

毫无疑问,亚洲人将在21世纪庆祝历史的回归。唯一的问题是,西方将加入这些庆祝活动,还是继续等待历史终结的到来?①

差不多一样,福山的学术导师、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步学生的后尘,在把“冷战”后世界矛盾的模式归纳为不同文明类型之间的“冲突”以后,也不断听到种种不同的反驳。像美国政治学者克莱斯·瑞恩(Claes G. Ryn)在2003年9月出版的《有德的美国:民主的危机与帝国的诉求》一书认为,当今世界的矛盾根本上并非源自各传统文明之间的泛泛差异,而是因为各文明社会在现代进程中的轻重缓急或扩张与自守等不平衡状况引发的,其中物质与政治利益的较量显而易见。这样的反驳启发人们进一步反思,所谓“文明的冲突”,其实也并非“冷战”后独有的世界现象,自古以来仿佛无时不有,如以往成吉思汗西进或十字军东征,都不妨如此解释。何以“文明的冲突”一定要成为描述当今世界矛盾的基本理念?

后来更有人具体分析道,若如亨廷顿那样,把1979年反对苏联入侵阿富汗视为不同文明的第一场战争,那么其后西方与伊斯兰的冲突称得上接连不断,甚至“反恐战争”表面看来也属如此性质。但另一方面,同属穆斯林的土耳其正在积极要求加入欧盟,其宗旨无非力争伊斯兰价值观与实力在欧洲获得平等地位。这样的努力,倒好像意味着文明的传统界限正逐渐消融似的。把个性与差异轻率推定为“冲突”,无非是热衷于“激化”的西方惯性心态,其实完全可以以不同的眼光看待与化解不同文明之间的价值落差。如有俄国学者所说:

文明冲突的发动机不单是战争,还有日益密切的交往、广泛的接触

① 基肖尔·马赫布巴尼:《奥巴马和西方重新研读福山,向东方看》,载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2009-11-10。

和不断增加的了解。就像人际关系间有时出现的情况一样,对认识的人了解越多,就越容易产生矛盾。

“挑战—应战—挑战”的秋千还在来回摆动。冲突的幅度是增大还是减小了?目前看来是前者。

这种情况会延续下去吗?“冲突”无法消除——我们过去是,在可见的将来仍会是千差万别的,因此冲突在所难免,但冲突可以缓解和遏制。无论伊斯兰教徒,还是基督教徒,都尝到了这种冲突的苦头。因此,何不坦率地承认冲突不可避免,甚至是长期的呢?何不学着如何相处,相互说服,相互学习,遏制冲突,不使它走向极端呢?^①

不过,简单回顾几年来“历史终结”论与“文明冲突”论引发的后续论辩与互动,既差强人意又难尽如人意,原因之一在于,两论都曾公开与潜在论及的亚洲各国,至今直接参与回应者寥寥无几,尽管有三言两语的零星点评却缺少完整与系统的阐述。与西方论坛的热烈回应相比,称之为东方话语的“角色缺失”实不为过。为此,有人甚感不解与不平,认为:“亚洲的商界领袖和知识分子有许多不同于西方的观点,但在全球论坛上却很少听见他们的声音。”世界论坛一直在期待,“亚洲人可以更好地发表意见、提出观点,从而对越来越多的西方智库宣扬其对亚洲的看法起到平衡作用。”^②

实际上,近20年来,当西方惊异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等“奇迹迭出”时,亚洲各国却此起彼伏,社会相对稳健,经济发展之快捷竟出人意料。尤其是中国,更“风景这边独好”,逐步超越了一个个发达国家的GDP总值,其实力已有不久后紧逼“巨无霸”美国的势头。如中国俗语所讲“西方不亮东方亮”,亚洲文明空前活力创造出的经济财富与价值,与西方国家因金融危机而“囊中羞涩”的尴尬形成了鲜明对比。新的世界景象与格局像把一句古老的东方成语颠倒了过来,可称之为“失之桑榆,收之东隅”。

中国社会发展日新月异,领导体制卓有成效,都映衬出“历史终结”论和“文明冲突”论日显苍白与捉襟见肘。然而,中国却至今少有人仗义执言,凭借本国的雄辩事实,正面、系统地回应这两种论断所立足的文化立场。这或许是因为倾向于

① 阿列克谢·马拉申科:《他们还是发生了冲突》,载俄罗斯《卡内基》,2007,9(4)。

② 钱德兰·奈尔:《亚洲要仗义执言,否则西方就会把你淹没》,载英国《金融时报》,2007-12-17。

“不争论”的少说多做态度,即东方智慧历来看重应变、过程的实际成效,不像西方文明那样热衷于抽象判断观念的对错与理论是非;或许是因为专注于排解自身改革进程的艰难险阻,无暇深究由“柏林墙”倒塌和东欧解体显露出的西方文化传统“软肋”;或许是意识到东西方文明差异巨大,仍据强势地位的西方思维方式未必肯虚心倾听,而不愿徒费口舌去阐释大相径庭的东方智慧,等等。凡此种种,都给人以中国学者在这场“跨世纪”论辩中不很理直气壮的印象。其实,如果说所谓“气不壮”是由于当今中国硬、软实力都还未达到美国那样“财大气粗”的地步,显得情有可原,那也不必因为东方文明从未奢望独步天下或与西方势不两立,就觉得东方智慧一定“理不直”。中国的文化理念确实不太像欧美文明那样,追求与信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刚性“铁律”之类,依据的是按照“天时,地利,人和”等弹性与动态标准实施变革的“法无定则”态度。尤其在大量借鉴与吸收西方思潮的近现代,中国从屈辱到复兴的历史进程,显示了不同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思维路线。众多可信的事实验证,百多年来中国自主、自强、自立的柳暗花明之路,决非所谓“守株待兔”或者“鹬蚌相争,渔人得利”等中国寓言所暗示的侥幸现象,而是独辟蹊径的东方智慧的自然之果,是有别于西方理念的另一种“必然”的“心律”。正像西方思想界已有少数睿智者开始领悟到的,明白中国智慧最突出的是“随机应变”的柔性内核:

的确,智者是“无理念”的——这绝不意味着他没有理念!——因为他不优先任何理念,也不由此排除任何理念,他观察世界,并不对这个世界有预先设定的看法。因为通过可能有的个人观点,他既不缩小什么,也不预断什么,因此他总是保持着一切可能性的开放性。所以,不存在强加给他的,并且预先决定其行为的“必须”;智者不遵循规则或箴言。他是“毋必”的。因为没有东西事先规范他的行为,则他的行为事后并不规定为常规。因为不囿于任何特别概念,他是“毋固”的;因为不隶属任何明确的观点,他随着形势和事件的过程,而不断地演变。^①

这种东方智慧观念,不是西方传说中那强行砍头去脚的“普洛克路斯忒斯床”,而要力戒“削足适履”或者“刻舟求剑”之类的蠢事。并且,中国历来不威严或

^① 弗朗索瓦·于连:《(经由中国)从外部反思欧洲——远西对话》,273~274页,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年。

玄奥地解释“圣人”们这种“无意”的态度,有时倒将其描述得相当轻松和诙谐,就像通俗小说《西游记》里唐僧师徒历经艰辛,最终去西天取回的竟是“无字真经”的故事,与佛教传入中国后生成的本地流派禅宗的“舍离文字,直探心源”特点如出一辙。再往后说,则有反对“本本主义”以把握马克思主义精髓,以及“抓住老鼠才是好猫”或“摸着石头过河”等种种形象的说法,都促成了当今中国称得上跨越东西方的如两种餐饮、两种服饰、两种医学以及两类哲学等中西合璧的文化形态。

与西方思想界的少数睿智者相比,“历史终结”论和“文明冲突”论的发明人讲起西方文化观念与理论来如数家珍,游刃有余,对东方文化传统却显得相当隔膜与无知。如果两位发明人只是对剖析苏联与东欧失败的原因感兴趣,中国人也许可以置之不理,但他们偏偏以强势文化的傲慢姿态信马由缰,借揶揄“社会主义垮台”,连带着也对东方文化传统指指点点。如此强不知以为知,隔靴搔痒甚至色厉内荏的轻率议论,让人觉得福山和亨廷顿仿佛受到西方政治气候的裹胁,难说是独立自主的学术态度。按福山的说法,美国的国际问题研究可分为四大群体:标举美国利益至高无上的新保守主义,主张见机行事的现实主义,立足于自由主义观念的国际主义,以及坚持本土与孤立立场的美国民族主义。^①而福山则自称“想要表明的立场不受当今关于美国外交政策辩论中任何一派的左右”^②,可归根结底也旨在为美国外交政策提供咨询,未必符合其标榜的自由学者身份。例如,在“历史终结”论里,人们不难透视出“中国崩溃”论的阴影;同样,宣扬“中国威胁”的人可轻易从“文明冲突”论中找到理论支持。可见,无论为东西方文明的真正相互理解而开始持久不懈的对话,还是破解眼下挥之不去的“中国崩溃”论及时有所闻的“中国威胁”论,中国理论界都无法回避正面、系统地回应“历史终结”论与“文明冲突”论的责任。

从历史关节上看,不妨把“历史终结”论理解为西方在“冷战”结束后环顾四周,一时难觅“敌对”身影而长长松吐的一口粗气。然而,毕竟西方思维那愿找“对手”,渴望“树敌”的定式难改,没过多久,便会有人从不同文明类型的差异与矛盾中嗅出象征着新时代的“火药”味道。福山与亨廷顿的两论便是这一心态的典型

① 弗朗西斯·福山:《美国处在十字路口:民主、权力与新保守主义的遗产》,5~6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

② 同上书,2006年版精装本《前言》。

与代表。按照西方文化传统,没有“对手”属于暂时的“反常”,“树敌”则意味着一如既往的“常态”。尽管西方论坛上已有人公开嘲讽,所谓“历史终结是个笑话,一个幻觉,一个理性的假象,一个哲学家仲冬夜的梦,一个诡计”,就像老师的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是另一类笑话,另一个幻觉反射”一样,^①但福山仍称中国代表着对西方式自由“长期的危险”。他甚至预测,日本不可能支持成立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民主国家联盟”。但出其意料,新近上台执政的日本民主党政权无视东西方之间的“民主”鸿沟,正尝试改变一向把中国视为“威胁”的立场。这对福山来说,不啻是来自其日本血统的一种讽刺。

所以出现如此尴尬的局面,无疑是由于福山、亨廷顿等美国主流意识形态,把西方传统的“自由”、“民主”观念与社会体制等看得过于狭隘和僵硬了。他们因为东方传统或中国等不肯全盘输入西方政治理念与制度,便视之、命之为“专制”、“独裁”或“威权”之类,显得太武断、太片面。实际上,百余年来,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各国都曾积极从西方汲取、借鉴过不少文明成果,如亚洲共和政体取代皇权未必不如欧美彻底,满腔热情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市场经济模式已经在社会主义国家落户,等等。久而久之,西方某些人便禁不住沾沾自喜,认为自身文明的这种“单向输出”天经地义,恨不得连时空也根本颠倒过来,仿佛地球黎明也该自西方开始才会心满意足似的。他们不屑于承认东方传统里还有值得西方文明效法之处。比如,不肯认真比较一下,美国耗费社会巨大资源的普选制度,其“性价比”一定高于中国的干部选拔办法么?当世界面临着新一波经济危机的时候,中国式宏观调控的经验,是否也可供西方自由市场体制参考?中医对于人体和生命的理解,难道不值得西方科学重视?诸如此类使人联想到,“东欧社会主义”的失败也未必意味着东亚国家只能选择资本主义道路。“柏林墙”倒塌与“9·11”事件后西方社会与经济遭遇的困境,其深层联系可以理解为:二者都是以“非此即彼”的西方二元论以及“线性”思维习惯,最终导致了物极必反的结果。当初,欧美社会主义者曾以为马克思主义发现了人类历史的“绝对真理”,四处发动和推动革命不遗余力。那种无视各国不同的社会实际,试图以共产国际来支配世界命运的设计,堪称与当今“历史终结”论异曲同工。令人深思的是,那样的思路与做法在东欧行

^① 贝尔纳·亨利·莱维:《美国的迷惘——重寻托克维尔的足迹》,243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得通,却在亚洲遭到不同程度的抵制。中国共产党后来坚持不干涉外国、外党内政的政策,可视为东方“过犹不及”的哲理对欧美“极端”与“纯粹”革命理念的矫正。最终,则是最具“正统”色彩的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一败涂地,曾经算不得“地道”无产阶级革命的东方式社会主义却能延续下来。在东方智慧看来,历来宣称“历史终结”的,均无异于奔向“死亡”和途穷末路。同样,即使世界各文明之间难免出现矛盾,也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引发摩擦或斗争的责任究竟在谁,以及是否咎由自取等问题。像美国曾经人人开超大排量的汽车,廉价耗油如流水,在各地长驱直入抢采资源,毫无互利与共存之念,其实曾经无异于挑起事端甚至教唆“冲突”,就同东方“和”的观念格格不入。

因此,当现今世界又一次被解读为“历史的终结”,各种文明之间重新被暗示将“冲突”的关口,不能不让人重新回顾与重温欧洲和美国资本主义统治地球两个多世纪的经验教训。前一个历史阶段曾以英国征服印度以及中国的衰落为主要标志,而新的世界格局也许意味着西方传统与东方文明之间关系的根本性调整,从而形成新关系模式。以此为契机,世界可能需要经历一次类似于当初西方“启蒙运动”的“另眼”看东方文明的过程,从而带来意识形态、文化心理与战略关系的巨大改观。

面对这样的世界文明前景,身为东方文明一员的中国应当承担什么样的历史角色或文化使命呢?

在任何一类文明结构中,各国能量的“砝码”当有轻重之别,其中包括幅员大小、人口数量、种族多少、历史长短、积淀深浅及传统强弱之类,众多因素决定了各国文明的特色与权重。伴随国家与时俱进的演变进程,这种种条件制约着现代化的方式与效果各不相同。也就是说,所谓“现代化”,应该是东西方文明的“合力”效应,如同雄雌共生孕育出新生命一样,你中有我,我中也有你。“西方化”自然要作用于各国“现代化”,反过来各国文明也会对“西方化”施加影响,推动西方文明重塑自身。在这一过程中,像中国这样文化积淀深厚、历久弥新的国家,无疑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中国人历来对本民族命运负责,将来也要对世界前途负责,毕竟当今人类已不是那种“老死不相往来”甚至“以邻为壑”的时代,而成了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整体。

据说,即使一时宣扬过不无偏颇的“历史终结”论的福山本人,目睹二十多年来东西方此起彼伏的雄辩事实,也已不再如以往那样自信甚至自负地宣称西方资

本主义是“最终的规范创造者”，或是“现代社会中最后一支教化力量”^①，而开始表现出谦恭、反思的姿态。日本媒体则引述说，福山在准备修正自己原有的观点，他承认：“客观事实证明，西方民主自由可能并非人类历史进行的终点。随着中国崛起，所谓‘历史终结’论有待进一步推敲和完善。人类思想宝库需为中国传统留有一席之地，中国亦需在自身发展进程中实践民主法制的理念。世界需要在多元基础上实现新的融合。”^②这似乎给人以一线欣慰与希望：大约当今世界已快到了东方人不随波逐流地表述自身的立场、观念或智慧方式，西方人也会平心静气倾听的时代。在这种新的学术氛围中，当西方主流意识形态与论坛不太可能无师自通地准确领悟东方文明独特思维方法及其深层价值的时候，中国学者理应遵循诲人不倦的求实传统，义不容辞地挺身参与涉及东西方文化关系的相关论辩，从具体问题入手，循序渐进地向世界阐释东方智慧体系，以求逐步改变以往国际论坛充斥单一西方腔调的非正常状态。

① 弗朗西斯·福山：《大分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317～318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② 《日本要直面中国世纪》，载《中央公论》，2009(9)。

绪 论

从中国文化视角看“历史终结”论与“文明冲突”论

本书是一名立足于东方文化立场的中国论者,对 20 世纪末国际学术界由“历史终结”论与“文明冲突”论引发的议论的回应和参与。这些回应也许算不上系统或全面,但与此前中国学者的有关言论相比,毕竟篇幅较大,而且不属于时政评论的思路与文风,其中表述的,是在当今背景下,关于东西方文化关系及世界文明前景的一些学理性思考与展望。

一

因应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世界政治格局一系列的重大演变,西方舆论界曾一时显得空前与格外躁动。一时间,仿佛“冷战”结束了,共产主义失败了,资本主义获胜了,历史步伐也从此终止了。这最后一种结论,首先源自大胆放言的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那篇名为《历史的终结?》的论文。其实,文章的题目原带有问号,本定位于试问或探讨的口吻,可在一些读者的眼中,其似乎寓有反讽的含义,简直就是变相的惊叹号,欲扬先抑的语气分外强化了论断的惊世骇俗与轰动效应。由于该文准时且准确地触摸到了西方神经的兴奋点,当作者后来将其扩展成专著时,一推出便博得“满堂彩”。如美国《华盛顿邮报》上的书评很有代表性,称“它令人敬畏……这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深刻、现实、重要……是对目前全世界变化及其广度的非常深刻的研究”。即使一贯并非偏激,立场比较居中的《纽约时报》,也承认它“写得一目了然……雄心勃勃……是

一部涉及哲学中最热门命题的著作……福山有资格严肃讨论这个命题”^①。

正在福山为自己能够“一石激起千层浪”而“没事儿偷着乐”的差不多同时，他的学术导师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则提出了世界迎来“二十世纪末的民主化浪潮”的说法。亨廷顿把那次“浪潮”排在20世纪初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两次世界“民主化浪潮”之后，列名为“第三波”，即百年来最后一次。顾名思义，以“浪潮”来指称各国“民主化进程”，便难以掩饰乐观其成甚至推波助澜之义。不过，从形象比喻上看，亨廷顿把“民主化”进程形容为“浪潮”，终归意味着既有高峰就有低谷，不可能总是所谓一路高歌猛进。相比之下，由于与当时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在西方激发的即兴情绪恰好共鸣与合拍，弟子福山直截了当的大胆“结论”，在论坛上赢得的风光不免让老师有点相形见绌。

这恰如中国成语所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按中国古人的经验，黑色的靛青染料原是从蓝色野草中提炼出来的，但色调之黑要比蓝草的颜色更加深重。这一形象的例子表明，中国智慧早已懂得，与就事论事或者举一反三的如实仿照比较，尽力凝聚提炼或升华结晶足以使后来者居上，可有“变本加厉”的效果，会比原有的东西更显得引人注目，用眼下时髦的说法就是更具“心理冲击”效果。与之相类似，同亨廷顿《第三波：二十世纪末的民主化浪潮》一书主要描述与罗列最近一次世界“民主化浪潮”种种迹象的写法有所不同，福山热衷于从各国纷纭复杂的社会与政治事例中，设法抽象和概括出内在的、具有普遍性的“民主理念”，旨在挖掘支配世界历史进程的唯一“铁律”，以使自己的论断“放之四海而皆准”。在自建国伊始便推崇“天才创造事物”^②的美国，如此“后生可畏”的学生获得比老师更大的学术赞誉，或许正在情理之中。

后来，当亨廷顿从关注“民主化”浪潮转而提出未来世界“文明的冲突”概念，并出版《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时，师生之间思维与理论模式的差异就有些分道扬镳了。为此，福山曾公开辨析过：

许多观察家把我和我从前的导师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相提并论，他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一书中提出

① 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中文版封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② 爱默森：《美国的哲人》，见《爱默森文选》，10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

了截然不同的世界发展模式。我认为,在某些方面可能过分夸大了我俩解释世界的观点。比如,我赞同他文化仍然是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如果不考虑文化价值,你是无法取得政治和社会发展的。但是,我们之间有根本的区别:是认为启蒙中产生的价值观念和机构是潜在的、普遍性的(如黑格尔或马克思的观点),还是认为这些是局限在某个文化视野内的东西[如后来的哲学家如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和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亨廷顿显然相信它们不是普遍性的。他认为我们西方非常熟悉的政治体制是西欧基督教文化的副产品,根本不能在超越这个文化的地方生根发芽。

所以,要回答的关键问题,就是西方的价值观念和体制是否具有普遍性的意义,或者仅仅代表了当前居于强势地位的文化暂时的成功。^①

应该钦佩学生福山“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大胆精神以及要言不烦的清晰表达。他三言两语点出了自己在基本观念上与老师的分歧,并踌躇满志地亮出了超越老师的学术勇气。后来,尽管陆续有欧美学者对福山与亨廷顿两人的学术见解提出过不同看法,用福山的话说是“遭到了可以想象到的方方面面的批评”^②,但至今人们对从根本上批评与矫正这一对师生既有联系又有差异的学术观点的偏颇与失误,仍感犹豫甚至底气不足。其理论靶点也是反驳的难点被归结成这样一种立场,即在当今与今后的世界上,难道能够否认“民主”理念的“普遍价值”,或者“民主”政治可以作为“普世制度”么?这俨然成了全部讨论的核心与要害。对这样一个似乎有“冒天下之大不韪”风险的命题,除非尝试用与欧美文化传统不同的思维方式去思考,否则确实难以置喙或介入,更谈不上所谓理直气壮了。

二

公平地看,无论说福山等人有理由“没事儿偷着乐”,还是他们抱怨“遭到了可以想象到的方方面面的批评”,都有些过于夸张或言过其实。“历史的终结”与“文明的冲突”这两个既有联系彼此间又有所区别的国际政治哲学命题,它们最应该

① 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终结之后》(《历史终结及最后之人》再版后记),2006年。

② 同上书。

庆幸的是并没有陷于以往像马克斯·韦伯的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问世后反应平平,想听到辩论、反驳竟难如愿的境遇,不仅引发了众多赞许或质疑之声,且声浪之大至今方兴未艾。当时与后来各国学术界对这两种论说持续了种种议论与评价,便意味着它们确实有被人们重视的意义与价值。但问题在于,至今对它们的回应,主要限于西方即欧美论坛。其中东方文化视角的缺失,如同人类对这一问题即关于全球新世纪文化前景的思考,还没有调动起另一大脑半球似的。

比如,法国解构主义哲学家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是最先对“历史终结”论提问出质疑的欧洲学者之一。他准确点到了福山命题的要害是:“它逼着我们考虑,历史的终结是否仅仅是一种特定的历史概念的终结。”^①尽管人们对德里达首倡的解构主义哲学观念至今莫衷一是,但这一质疑却并非故弄玄虚,通俗地说,就是他怀疑甚至反感西方文化传统那种无条件崇拜词语(命题、概念、范畴之类)人为含义的习惯,试图以内涵所指的灵活性、流动性去矫正对词语意义的僵化理解。在德里达眼中,福山判定因“民主”、“自由”等观念已无可替代地“名冠天下”而“终结”了人类历史,其实恰恰空前凸显了抽象的“民主”理念与活生生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这正好反衬了西方“理念崇拜”传统的自以为是与尴尬。他提醒人们,与其为抽象的“民主”理念高唱赞颂之歌,不如更加密切关注全球和人类历史上那些不平等、排外、饥荒甚至暴力等非人道现象并未根本好转的现实。

另一位法国后现代理论家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则在世纪之交前后,把所谓“历史终结”的说法称之为一种“幻觉”。在鲍德里亚眼中,现代化进程无非意味着按“理念”或“符号”去模拟现实的社会趋势日益强化,而“历史终结”论与“文明冲突”论同样反映了以虚幻的人为观念去捏塑现实的企图。鲍德里亚深知福山对尼采情有独钟,他引用了一段尼采的话去反刺福山的“伤疤”,最具针对性也最显讽刺的意味:“什么是真理?真理就是一些可以移动的比喻,……使用的时间长了以后,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就成了固定的,规范性、约束性的东西。真理就是我们忘记了它是幻觉的幻觉。”^②如此调侃使人们有理由联想到,福山试图跨越

① Jacques Derrida, *Specters of Ma; The State of the Debt, the Work of Mourning, and the New International*, trans. Peggy Kamuf,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1994, p. 15.

② Friedrich Nietzsche, *On Truth and Lies in a Nonmoral Sense*, in *Philosophy and Truth*, trans. And ed. Daniel Breazeale, Sussex: Harvester Press, 1979, p. 84.